

新产业革命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佟新

1 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新产业革命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劳资关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其特点在于:知识与技术的力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本的力量发起挑战;同时它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即便是新型的转入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的力量发起挑战。

在最近的几年里,中外学者都看到了知识与技术所具有的改变社会结构的力量。1994年,美国一学者用详实的资料分析了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他提出了“认知精英(cognitive elite)”的概念,在他看来,认知主要是智商方面的,是语文、数学和空间感知三项能力的综合。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基本是按金钱、权力和地位划分阶级的,古代的世袭门第越来越不重要,财富、文凭和才智则越来越重要。而21世纪将开始一个以认知能力为决定性力量划分阶级的世界,现代技术社会对认知精英的需要越来越大,金钱和权力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认知精英身上,技术的进步使得现代社会从各个角落中筛选和抽取认知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强,聪明人本来就与社会其他部分高度隔绝,而以后只能更加隔绝并难以逆转,政府对此将回天乏术^①。中国也

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分层的断层线很可能划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这一趋势现实并已显而易见^②。1997年美国一学者提出的问题更加尖锐,在他看来,信息技术瓦解了等级结构,把权力分散到更多的人和群体当中。由于极大地降低了通讯、磋商和协调的成本,新技术把分权化的网络结构置于比其他组织模式更为优越的地位。在网络中,个人或组织可以互相联系以采取联合行动,却用不着建立一个有形的或正式的实在机构。在网络中,没有任何人居于最高或中心地位。另一方面,政府的精髓却在于等级结构。新技术促进非机构化的、灵活转移的网络,而不是固定的官僚等级结构,而后者恰恰相反是单一声音的主权国家的标志。新技术消除了问题、机构和一个固定地点相联系的办事模式,弱化了个人对于社团的相对依附^③。

总之,无论学者们为我们描述的21世纪的“世界地图”是否准确,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知识与技术

正成为一种独立且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它正从深层意义上改变着理论上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在改变着现实的劳资关系。

2 对劳资关系的认识有着种种观点,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至今仍是认识劳动与资本本质的经典,是今天我们认识与理解劳资关系的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强调社会组织经济基础、强调由经济利益引发的阶级和阶级冲突,同时强调意识形态对维持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以马克思的观点看,人在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是生产关系,它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和最本质的关系。生产关系的内容有:(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3)以前两种关系为基础的产品的分配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两部经典著作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雇主与工

人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其本质是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马克思对于劳资关系的研究是构成其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愈增长,雇佣劳动量就愈增加,雇佣工人人数就愈增加,一句话受资本支配的人就愈增多。”^④

具体形态上的劳动者(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深刻矛盾与冲突,在当今社会抽象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并未因知识与技术的增长有本质的改变,资本仍本能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改变的是劳动与资本的内涵;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分析,以信息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和资源占有正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生产方式,为控制与分配信息而发生的矛盾与冲突正成为一种新的冲突形式。作为产品与资源的信息,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之间形成了各种令人思考的模式,它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劳动与劳动关系,其最终所产生的结果

还是未知的。这种种改变无疑对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3 在现代的劳资关系中,资本与劳动的内涵与资本主义早期有了显著的、甚至是本质的差别。首先,资本已不再仅仅是直接可以转换为金钱的、以财产权为形式的经济资本,而且还包含着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的文化、智能资本与社会资本,即资本不再仅是单纯的物质形态,且可以是文化与社会非物质形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对比尔·盖茨及其公司的定义,我们对其资本的估价是不可能抛开他个人所具有的知识和他那个无法估价的、令世界惊奇的头脑。也就是说,具有智能的人本身就成为了资本的一部分。其次,信息社会中,物质资本的转移速度或者说是使用资本的效率大大提高,几秒钟内大笔金钱就可以进行洲际的进出。鉴于上述,可以说,技术提高了资本的力量,资本在各种技术的配合下控制人、异化人的力量更强;但另一方面,人也成为资本的一部分,当知识不断增长,技术手段不断花样翻新时,人所具有的控制物质世界的力量也是不可低估的。

在资本的内涵变化的同时,劳动的内涵与劳动者的构成也在改变。一方面是劳动的内涵超出了马克思当时的定义。大批的管理人才、高科技人才是劳动者,但又不是马克思所论述意义上的雇佣工人,他们既受资本的雇佣,同时又具有支配资本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发生分化,这种分化主要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之中,高科技人才与管理人才的供不应求与大量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的供大于求形成鲜明的对照,并反映在收入领域的两极分化上,这种两极分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所有者(或劳动力使用者)与劳动者的分化。

从社会分层的意义上说,劳动者自身的分化,主要源于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市场。一个市场可以称之为高级劳动力市场,他们是由知识与技术精英组成的,他们在新的产业结构下具有无限的稀缺性,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失业与就业的概念,只有拿报酬多少的区别。而另一个劳动力市场是传统意义的劳动力市场,也可以称为是次级劳动力市场,它们以非知识与技术型劳动力组成,在新的产业结构下,他们具有相对意义上的、甚至绝对意义上的饱和,其供大于求的状况,使其失业(或称不充分就业)成为常态。这两种劳动力市场并存,其显著的特点是:第一,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格因供需关系有明显的差别,高级劳动力市场的高收入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低收入形成鲜明对照;第二,两者的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尤其体现在对经济资本的支配力量或议价力量上,即高级劳动

力市场的人才具有支配资本的力量;第三,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有着鸿沟,难以逾越,对于一个非知识与技术型的劳动力来说,是无法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的,虽然它总是短缺的。

上述状况已在国内外普遍存在。以教育程度为例,由于受教育的不同而导致的经济地位的差别(主要是工资差别)普遍地存在于各个领域和各个国家。美国二三十年代的发展经验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经济虽然在近30年内有着稳步的增长,从1979年到1987年,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青年的实际工资上升11%;而同期只受过中等教育的男青年的实际工资则下降20%。又一统计表明,从1973年到1993年,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美国人的每小时实际工资从11.85美元下降到8.64美元^⑤。在智利,从1980到1990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相对于高中毕业生上升了56%^⑥。从中国的现状看,一方面是大量的员工下岗,另一方面则是高科技人才的供不应求。1998年2月15日中央电视台的经济新闻披露,计算机行业的高科技人才月工资在8000—15000元,且市场对此类人才的需求增长为25%,大量的位置等待着高科技人才的进入。

无可否认,信息社会的劳资关系是更加复杂了。其本质的特点就是出现了一种智能的力量;相对于资本而言,它成为资本的一部分,甚至具有了凌驾于经济资本之上的权力,这从各大企业集团对于高科技人才的求贤若渴看出。相对于劳动而言,它成为淘汰大量体力劳动、甚至是非技术化、非智能化劳动的力量。当代社会对于非技术劳动力的剥夺不再仅仅是来自原始意义上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还来源于技术劳动力对劳动岗位的有效侵占。可以预见的是,信息社会的劳资关系将是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或者是技术人才加盟资本的队伍)和非技术劳动力的弱势地位,且这种弱势地位从绝对意义上看,是难以改变的。

在中国正在为“充分就业”而努力的时候,西方人已开始讨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的“消亡”。信息社会劳资关系的状况在目前范围内正导致着西方社会一场日益引人关注的劳动危机,这一危机的特点是大量非技术工人,甚至是办公室人员(白领员工)的失业。如果说18世纪末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实质是以机器的机械力量帮助人的体力劳动并越来越多地取代它的话,今天的工业革命则发生在脑力劳动领域,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传统劳动消亡,结构性失业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并由此将产生一场有关就业文明的革命。

无数的研究数据说明了工人阶级面临的结构性失业。1995年美国出版了杰莱米·里夫金的著作

《工作的终结——全球劳动力的衰落和后市场时代的开始》。根据法国著名左派学者安德列·高兹的统计,1961—1988年间英国的工业工人阶级的规模已缩减到了44%,法国为30%,瑞士为24%和西德的18%。在1975年至1986年的12年间,1/3甚至一半的工业工作已在几个欧洲国家消失。在20年中,法国失去了它在1890—1968年间所创造的几乎同样多的工作。美国学者乔治·华盛顿教授在1996年预测,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蓝领工人将会从1995年占美国劳动力的20%缩减到10%,甚至更少。同时由于办公室工作自动化,非专业白领工人比例很可能从现在的大约40%减少到20%—30%。其余的60%—70%左右的劳动大军可能由知识型人员组成,他们是掌握技术的制造人员、信息系统的设计人员、经理人员、教授、教育工作者、科学家等。传统的“劳动”将消失,随时应聘的劳动大军的人数将急剧增长,从1994年占美国劳动大军的1/3到2000年占一半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工作消亡的同时,大量的工作在服务部门被创造出来。

但无论服务部门具有多大的创造力,或者说人们对于服务的市场需求到底能有多大,结构性失业导致的结果是广大非技术性劳动者的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现实的结果是,在资本、技术与劳动的关系中,传统劳动的弱势地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趋于强化。不仅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还出现了知识与技术替代劳动,资本、知识、技术与劳动的关系不可避免地符合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

5 那么,在新的知识与技术精英独领风骚,人类物质财富已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寻找到改变资本、技术与劳动三者不尽如人意的关系状态的有效办法呢?如何应对广大非技术性劳动者的劳动问题及收入问题,是任何国家政府都无法逃避的,这个问题正是当今发达国家正在面对的社会难题,也将是发展中国家将要面对的难题。当代发达国家正在使用各种手段改变上述状况,有些国家通过立法与税收,加大社会福利;还有些国家正着手出台各种各样的缩短工时的办法,以达到较充分的就业;还有些国家通过提高工会的议价能力,来保证工人的生活水平,这一切的劳动政策都表明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一种超越市场的力量,即一种制度性的力量来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利益,通过构建制度性的再分配制度实现资本、技术与劳动的相对均衡。如果说,不对社会收入实现再

分配将无法解决这一全球性的难题,而构建制度性的再分配制度更多地要依赖于国家的力量。国外已有学者对劳动就业的国家功能提出论断,认为:“今后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就业水平和劳动方式必然与国家努力的成败有关。”^⑦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信息革命的结果必然引起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甚至会涉及到国家理想与价值的变化。从西方福利国家看,通过各种税收所实现的再分配,曾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目前正面临挑战,一方面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福利的负担越来越庞大,即使是富裕的国家也将会有不堪重负的时候;另一方面,有舆论认为,不用付出而领取最低生活费的做法会滋长劳动者的惰性,败坏社会风气。国家再分配制度应当在均衡资本、技术与劳动力量的同时,倾斜于劳动,即以劳动为中心,这需要以民主思想为基础,以立法为手段。国家在维持力量均衡的情况下,要加强智力投资,通过立法加强职业培训,提高非技术性劳动者的知识水平与能力,这虽然是一项艰苦而漫长的事业,但对于具有时代特点的非技术劳动来说却有着深远意义。

应当看到,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影响劳资关系的变数还很多,许多问题难以预见。但就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危机与新的劳资关系形式而言,人们的认识还尚不充分,对其理论的探讨更显不足。

注释:

① Richard J. Herrnstein, Charles Murray,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1994 Simon & Schuster Inc., New York.

② 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③ Jessica T. Ma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367页。

⑤ Ethan B. Kapstein, *Workers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6.

⑥ 《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一体化世界中的劳动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⑦ [法]居伊·蒂利埃:《劳动政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7页。

[作者简介] 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